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文艺
湘军

百家文库

文艺评论方阵

罗成琰 卷

惟楚有材

新平知
PDG



文艺评论方阵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文艺评论方阵
PDG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文艺评论方阵

责任编辑:萧汉初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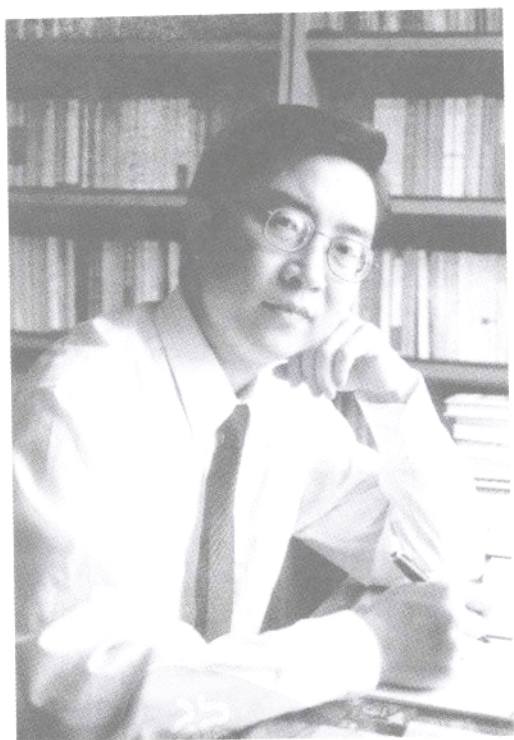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 千

ISBN 7-5404-2424-9/I·1812

本方阵定价:198.00 元 本册定价:1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羅成琨

湖南师范大学稿纸

商品经济的浪潮迫使作家的作出选择：是保持操守、气节，宁可忍受清贫、寂寞，也不放弃自己的人文理想与艺术追求，还是在市场，根据市场原则来进行创作，写出一批“五斗米”、“俗文学”、“畅销文学”的作品，或者干脆弃文经商。作家们也有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张承志、张炜、韩少功他们对商品经济的崛起则人文精神的沦落痛心疾首，愤也犹愤，他们以笔为旗，抵抗妥协，呼唤清醒，呼唤坚守，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以王朔为代表的另一批作家则成了商品化浪潮的弄潮儿，他们如鱼得水，不仅建立了一套新的适应市场经济的作价体系，而且根据商品化逻辑进行创作。马一浮、叶圣陶、张其成、陈文夫、

15 x 18 = 270

第A、10、98、12

第 页

总 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这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

必要的。这套文库，与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为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001

在历史选择中艰难行进的现代中国文学思潮 /001

论现代中国的浪漫传奇 /023

野蛮与文明的冲突 /043

乡村与都市的分裂 /058

童心与世俗的对立 /086

鲁迅与魏晋风度 /097

郭沫若与屈原人格 /115

- 沈从文构筑的都市世界 /129
曹禺《北京人》的文化价值取向 /142
丰子恺散文的佛教意蕴 /158

- 儒家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173
论当代作家的文化意识 /195
商品经济大潮中的文学 /201
呼唤科学的社会——历史批评 /209
创造性的背离与重构 /214
走向成功与面临挑战 /218

- 怅望千秋的历史情怀 /245
一部文学性传记的探索之作 /250
开拓者的可贵收获 /259
一本“大题小作”的书 /261
《郁达夫短篇小说集》序 /263
《朱自清絮语》序 /271
《麓山雏唱》序 /281

罗成琰主要著作目录 /284

总跋(谭 谈)/285

在历史选择中艰难行进的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

历史不会死亡，“因为它永远把它的开端和它的结尾联接起来”^①。所以，我们依然以浓厚的兴趣探寻着在历史选择中艰难行进的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的历史，试图在忍痛割舍掉大量丰富的甚至是意味深长的局部细节之后，在对原有的文学史材料进行重新整理、构建与阐释之后，为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轨迹，并从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特征等方面对五四时期和三四十年代文学思潮的差异进行一番粗疏的比较。当然，勾勒和比较的终极目的，并非只是希望再现或重建过去，也许我们更感兴趣的还是现在与过去的一种“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我们“并非只从已经消逝了的生活的知识中寻求满足一种知识欲，而是寻求某种精神的充实或吸取某种教训”^②。我们渴望在对过去作出新的理解的同时，也对未来作出新的展望。

从表现人生到介入政治和与政治认同

西方列强用血腥的大炮轰开了东方闭关锁国的万里长城,使中华民族置身于空前耻辱与巨大灾难之中,但同时也为尚在中世纪愚昧黑暗中昏睡着的东方巨人送来了一枚禁果——西方现代文明。这枚禁果一经吞下,便注定我们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伊甸园”,也注定我们要在痛苦中崛起、超越。于是,凤凰在烈火中涅槃,宁馨儿在阵痛中分娩,现代中国文学思潮便在这样的背景下接受着历史的庄严抉择,并开辟着它坎坷的道路。

五四作家试图将文学既从“道”中解放出来,也从“载”道中解放出来。人的觉醒的时代主题,决定了这一时期文学在多元追求中以“表现人生”为主潮。

五四时期文学是从两个方向开始它伟大的革命进程的。一方面,它坚决地要用西方现代文化现代意识取代传统的封建文化封建意识;另一方面,它又急切地渴望文学回到自身,保持审美的独立性和非功利性。也就是说,五四时期的文学既反对封建的“道”,也反对一味的“载”道。正因为如此,五四时期在文学观念上呈现出开放性与多元化的局面,当时有那么多独具风姿的文学社团、文学期刊和作家个人,有那么多标新立异的文学主张和艺术宣言。但是尽管如此,从当时那喧闹甚至有些嘈杂的多声部合唱中,你仍能分辨出一个多重变奏的主旋律——“表现人生”。

近代洋务派“船坚炮利”政策的破产,辛亥革命半途夭折的教训,给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以巨大的刺激。他们似乎幡然醒悟:单是物质技术和政治体制的变革都不足以救中国,更要

紧的是“立人”，是造就一种现代国民。于是他们上承梁启超的“新民”学说，仿效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主义运动，将自己的兴奋点由政治革命转向思想革命。声势浩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的空前觉醒。

人的觉醒的时代主题，决定了五四时期文学在多元追求中必然以“表现人生”为主潮。尽管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文学的觉醒，出现了作家们维护文学的尊严，追求文学的“全”与“美”的愿望，但是过于严酷的中国现实，实际上不可能给文学留下更多的独立的时间和空间，而文学自身也不可能置生灵涂炭的惨淡人生于不顾。因此，文学觉醒的浪花往往被人的觉醒的浪潮所吞没。当时一切有着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作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表现人生，指导人生”作为自己的文学理想和追求。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固然如此，即使当时倡导过“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同人，也不得不自相矛盾地大谈文学的社会使命、功利价值。至于他们的创作更是迈出了艺术的“象牙之塔”，走上了风雨飘摇的“十字街头”。

应该指出，“表现人生”的文学思潮是一个纷纭繁复的世界。不同的作家对现实人生有着不同的视角和阐释。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多从人道主义出发，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与小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笔端浸透着深切的同情和怜悯；创造社的作家则常常从个性主义入手，诉说性的苦闷、生的穷愁和时代的悲哀，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个人尊严、个人价值、个人欲望的执着追求。而且五四时期的作家主要关注的是思想启蒙，所以他们有意无意地与政治保持着一定的间隔和疏离，也因此他们对“人生”的理解非常宽泛，他们当时表现的是“整个人生”^③，“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④，而并非局限于人的政治生活、政治意识和政治关系。此外，五四时期还尚未出现一

种完整的、划一的、富于权威性的文学观念,不同的作家对多种文学观念作出了各自不同的选择。他们在强调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时,也注意到文学自身的规律,在重视文学的社会功利层面时,也没有忽略文学的审美价值层面,因而你在五四时期绝少发现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也很难找到典型的“载道”、“训世”的文学。

政治选择了文学,文学也选择了政治。“政治化”是三四十年代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

西欧各国从中世纪过渡到现代,用了差不多三四百年,而历史所容许我们的却只有几十年。改造国民性,创建现代文化,这是需要好几代人旷日持久的努力才可能完成的伟大工程。然而,民族的危亡,国家的兴衰,人民的苦难,在现代中国已成燃眉之急。人们已经无暇从根本上缓慢地改造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意识和狭隘保守的文化心理结构,无暇广泛深入地传输自由平等、民主民权等现代观念,无暇思考有关人生宇宙等形而上的问题,而是集中全力于严峻的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时代所要求文学的已不再是广泛地表现人生,而是集中地反映人生的核心——政治;时代所关注的也不是文学的独立性与艺术性,而是文学的政治性和鼓动性。于是,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三四十年代出现的大量要求文学政治化的主张,尽管有许多简单、幼稚甚至粗暴之处,但仍为人们广为接受;你也能够明白,为什么梁实秋、苏汶、施蛰存、沈从文、朱光潜等人要求艺术独立于政治的观点,尽管在理论上不无合理性,但在当时却显得那样不合时宜,因而受到历史的嘲笑。

政治选择了文学,文学也选择了政治。现代中国作家的普遍政治化,决非只是时代使然,同时也是作家们的自觉追

求。五四时期作家那种现代文化意识,那种思想启蒙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在这时被浓缩、凝聚为强烈的政治意识、阶级意识。结果,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便出现了两次作家大规模介入政治的热潮。第一次是大革命前后,不少作家出于对思想启蒙的失望,更出于对政治革命能够改变一切的热切而又天真的期待,因而都对文学表现出某种鄙屑态度。鲁迅当时便说过:“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⑤所以,当时许多作家纷纷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即使大革命失败,把作家们又抛回到文学领域,他们也一改五四时期“表现人生”的文学主张,而集中探讨文学与革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1928年革命文学口号的论争,正式标志着从“表现人生”的文学思潮到“表现政治”的文学思潮的转换。第二次是抗战期间,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现代中国作家集合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自觉地把创作同整个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提出“以血泪为文章,为正义而呐喊”^⑥,呼吁“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许多作家离开亭子间,奔赴抗日前线和民主根据地。即使像艾青、卞之琳、戴望舒、何其芳、李广田这样一些曾一度热衷于抒写个人纤细情感,流露出唯美倾向的作家,也陆续置身于政治的激流,开始歌唱战斗,歌唱革命。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著名命题,实际上是对三四十年代普遍存在的“为政治”的文学观念的一个理论概括和总结,只不过它进一步加以发展和强化,从而对以后几十年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当然,在三四十年代,“表现人生”的文学思潮依然存在,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现了巴金、老舍、曹禺等一批优秀的

民主主义作家。不过,这一思潮与整个政治化的左翼文学思潮相比,声势和影响都微弱得多。而“为艺术”的文学思潮虽然也在这一时期热闹了一阵,产生了新感觉派小说、现代派诗歌、何其芳等人的散文,以及朱光潜的美学理论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作为文学思潮,它仍生不逢时,很快便归于沉寂。现代中国实在是无法给“为艺术”的文学思潮提供一个适宜的生存土壤。

如果说“表现人生”的文学思潮以真实性为艺术生命,那么“为政治”的文学思潮则以政治性为艺术生命。政治本位强化了三四十年代的阶级意识与群体意识。

五四时期的作家主要关注的是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因而真诚地看待人生,如实地表现人生,便成为他们共同的创作准则。虽然文学研究会作家更强调再现生活的真相,创造社作家更强调表现内心的真情;但他们都着眼于一个“真”字,对他们来说,“艺术的价值,完全在一真字上”^⑦。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则更注重文学的政治性和革命性,在他们心目中,文学已是“革命的前驱”^⑧,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⑨,是“激励人民发动大众最有力的武器”^⑩,最后,文学被毛泽东概括为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于是,文学由介入政治逐渐地转为与政治完全认同,政治性成了评判作品成败优劣的第一标准,成了检验作家革命与否的试金石。

文学观念的这一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三四十年代文学思潮的整体面貌,特别是强化了文学的阶级意识与群体意识。如果说五四文学的最强音是“我首先是一个人”的话,那么三四十年代文学的最强音则是“我首先是一个革命人”。作品的人物往往被置身于特定的阶级关系中,五四文学中复杂的网络型的人际关系已很少见到。而对人物进行哲学、历史、宗

教、伦理、心理的多维思考也被严格的阶级分析所取代。从茅盾的《虹》，经“革命加恋爱”作品的发展，到后来沙汀的《闯关》，艾青的《火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复杂的人生问题已简化成单纯的政治问题，个体生存的意义和价值都萦系于革命的意义和价值。与此同时，阶级意识的强化，使作家们逐渐丢开自己所熟悉的生活，而以最大的热情去选择和表现“那些最能完成目前新任务的题材”^①，于是，表现劳动群众，尤其是农民的生活与斗争的作品，成为三四十年代文学的主体。

从20年代末开始，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精神逐渐与中国传统的群体本位观念相融合，这对现代中国作家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他们几乎完全放弃曾经热烈追求、心向往之的个性意识。不用提“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对个性主义的彻底清算，就连艾青也从歌唱“太阳向我滚来”转为“我们滚向太阳”，就连何其芳也异常坚决地宣告：“一个诚实的个人主义者除了自杀便只有放弃他的孤独和冷漠，走向人群，走向斗争。”^②因此，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群体意识挤掉了个性意识，“我”几乎完全消融在“我们”之中。当丁玲突然在《在医院中》重新提出个性要求，描写个性意识与群体意识的尖锐冲突时，她弹出的确实是一个与周围环境和时代氛围极不和谐的刺耳音调，因而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人们的严厉批评。

今天，我们已经能非常清醒地看到“为政治”文学思潮的某些明显缺陷，比如对政治意识、群体意识的过分强调，对个性意识、审美意识的过分忽略等。这些确实使“为政治”文学思潮自身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以至于它始终未能产生能与鲁迅以及其他民主主义作家的作品相媲美的艺术杰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但是，“为政治”的文学思潮也给现代中国文学带来了虎虎生气。它所具有的那种献身于民

族解放事业的崇高精神,那种慷慨悲歌、壮怀激烈的政治热情,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艺术鼓动性和感召力,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尽管“为政治”的文学思潮本身并不完善,但它仍将永彪史册,为后人所景仰。

从与世界文学融汇到向民族民间文学复归

近代中国,军事上的失败所导致的是人们对几千年传统的重重疑虑和普遍失望。人们处在一个令人困惑的两难抉择中:一方面我们要借助西方先进文化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实现又只能建立在民族文化的基石上;一方面我们要用西方文化来改造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在这种“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中我们又必须维护民族文化的尊严。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构成了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主题。它体现在文学中,就是一方面我们要迫切地与世界文学融汇并保持同步,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坚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一方面我们要提高普通民众的审美水平和审美能力,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适应普通民众的审美要求和审美习惯。实际上这也就是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对此,五四时期文学思潮与三四十年代文学思潮表现出了它们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

对于五四时期作家来说,“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不只是空间概念,而且也是进化概念和价值概念。新文学的雏形是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建构起来的。

如果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变革是以对传统的热情肯定的方式进行的话,那么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则是以对传统